

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与演进： 一个历史地理学视角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长期以来, 国内外文献对中国经济体系问题多有关注, 但总体上缺乏历史地理学角度的考察。可是, 中国经济体系形成的深层机理恰好掩藏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文章旨在为探究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与演进提供一个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在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中, 特定的地理因素在起点上赋予其特殊禀赋并对此后的演进路径施加影响。数千年来, 基于黄土高原的地理约束, 中国先民一直在艰苦探寻成本最低的经济制度安排。在此过程中, “满天星斗”般闪烁的多元文明汇流于中原区域, 铸就了文明核心区, “和而不同”与“因俗而治”渐成基本理念, 而横亘高原北部边缘的农牧交错地带以及由此产生的农牧力量的冲突与融合, 则不断锤炼着中原腹地的经济行为方式。唐宋以来出现的政治中心北留与经济中心南移的空间组合, 持续内生对统一经济模式的巨大需求。而游牧文明曾经施之于中原文明的边缘冲击连同近代以来源自西方的外部冲击, 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自省、成熟与更新。绝大多数时期中国经济体系都在封建与郡县或者分权与集权之间周期性摆荡, 千百年来人们对经济体系最适结构孜孜以求, 虽然既往文献未见明确刻画, 经过汉唐的检验, 合理调配上层与民间力量的基本内涵却清晰可见。值得关注的是,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启动的经济改革进程中, 这一基本内涵及其绩效已然以政府与市场合理搭配的方式得到新的体现与检验。

关键词: 中国经济体系; 黄土文明; 农牧文明冲突; 基本经济区; 历史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1) 04-0081-12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 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一度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一时间, 探讨中国经济奥秘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 从既有的文献考察, 着眼于历史地理学视角讨论中国经济体系形成与演进成果并不多见。虽然一些成果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涉及了早期的地理因素对经济体系形成的影响, 但缺乏系统性的专门研究,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由于缺乏历史地理学角度的考察, 故不能完全解决不少困扰经济学界多年的理论难题, 比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何需要政府因素的长期伴随、为什么中国没有遵循欧美路径却能取得长期的经济增长等。或许, 中国特殊经济体系形成的深层机理就掩藏在早期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

按照常理, 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基于特定的地理条件而进行, 而地理条件又是外生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 鉴于地理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受到有关“地理环境决定论”^① 争执的干扰, 人们

作者简介: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方向: 经济史、制度金融学、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

^① 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有体现, 此后盛行于 18 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地理学界, 广泛流行于社会学、哲学、地理学、历史学的研究中, 以拉采尔、赫特纳、魏格纳等人为代表人物。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认为, 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决定作用, 地球上的人口分布、种族优劣、文化高低、国家强弱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等, 无不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支配。这种理论在西方社会经济上升时期产生, 对否定神的旨意决定社会发展的观念有一定进步作用。但是, 单纯用地理环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 用自然规律代替社会规律, 无疑是片面的。

通常不愿意触及地理因素在经济体系形成与演进中的作用。正因如此,不少事关地理因素的问题无法得到深入讨论。其实,讨论中国经济体系的形成问题时,地理因素不可或缺,因为中国的经济体系具有长期的历史积淀与传承性质,而在此过程中,特定的地理因素在经济体系的起点上就规定或者预设了相关禀赋以及此后演进的路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种影响及其制度积淀持续了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直至经济改革与开放的当下,这种影响依然或多或少地渗透于经济体系的构造及其运行过程中。

本文无意介入地理环境决定论孰是孰非的争执,而是坚持认为,地理因素对一国经济体系形成与演进具有极为重要的初始影响,且在随后人类的经济努力与地理环境的互动中决定经济体系的结构与演进。毋庸置疑,“人类的很多伟大成就是通过克服自然的限制而取得的,与此同时,人类也一直倾向于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利用地理”^①。中国经济体系的长期演进过程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持。

一、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天设地造的文明孕育平台

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展开的,这些特定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的社会行为方式、生存生活理念、资源配置模式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千百年来,中国之所以形成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与其文明起源时期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具有紧密联系。

谈及中国文明的起源,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特殊地理(地质)事件难以回避,即青藏高原的隆起。乍看起来,这种特殊事件与中国的经济体系毫无关联,但它与随后黄土高原的形成直接相关,而黄土高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摇篮。虽然学术界对青藏高原开始隆起的地质年代及其高程尚有争议,^②但最迟至第四纪时期(距今约250万年),青藏高原已经抬升至4000米以上的高度。对于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构造而言,青藏高原抬升的意义极为重大。

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高程改变了北半球风带的运行结构。由于自转和太阳辐射的不均匀性等因素的影响,地球上产生了沿纬度分布的数条风带,在北纬30°—60°之间(也就是黄土高原所处的区域)形成了北半球西风带或北西风带。青藏高原在第四纪抬升到平均4000米以上,且宽度占北半球西风带的1/3,以其硕大的体量将北西风带一分为二,其中北支西风沿青藏高原北缘向东流动并向南扩展,这种流动对于黄土高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北支西风激流经过干旱的中亚戈壁沙漠地带,将那里的细颗粒物搬运到如今的黄土高原区域。早在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提出了“黄土风成说”。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等提出“新风成说”,进一步论证了黄土高原是由东亚季风对周边沙漠特别是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风沙搬运而成,且将之前只强调搬运过程的风成作用扩展为物源—搬运—沉积—沉积后变化的完整过程,风成学说遂成学界共识。

对于黄土高原的形成,北支西风只是搬运工具,还需要丰厚的沙尘资源。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广袤达240万平方公里的巨大身躯几乎完全挡住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使高原北

^① 李峰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汤惠生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

^② 关于青藏高原形成的地质年代,有人认为在距今约3000万—2000万年的渐新世末到中新世中期,发生了波及中国全境且影响至今的喜马拉雅运动,在此作用之下,青藏高原抬升、西北高山隆起,东部地势下降。参见王星光 《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7页。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距今350万—260万年前,在鄂尔多斯地块西南侧兴起了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青藏高原剧烈隆升,平均高度达到4000米以上,喜马拉雅山、昆仑山、秦岭等东西走向的山脉陆续形成。参见肖明:《黄土高原:上苍为中国特制的“舞台”》,《中国国家地理》2017年第10期。有人根据高山栎化石的鉴定结果,认为在近4000万年的时间里,青藏高原地区只是普通的低矮高原,其晚近的剧烈隆起更像是200万年内的一次突发事件。参见萧春雷 《青藏高原的伟大崛起》,载《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10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青藏高原在6000万年前开始隆升,到3500万年前就已“长大成人”,升至4000米以上的高程。参见王蕾 《破译“藏北地书”——解读青藏高原生物演化的化石密码》,《中国国家地理》2019年第8期。

部的广阔区域干旱少雨。大约从距今 300 万年开始，这一地区地表物质经历了强烈的地理风化过程，逐步形成面积巨大的戈壁沙漠，其中粒径小于 0.25 毫米的细颗粒物便是此后塑造黄土高原的最佳材料。^① 早于第四纪，一系列地质运动使位于黄土高原核心地带的鄂尔多斯台地“淡定而和缓”地大面积均匀抬升，并在黄土高原周边塑造出数条山系，如西边的贺兰山、北边的阴山、东边的吕梁山和太行山、南边的秦岭等，减少了黄土高原区域的湿润程度，并且随时准备承载来自西北方向被北支盛行西风搬运而来的黄土，使其在特定区域内稳定堆积。

青藏高原的抬升不仅使原来的诸多古湖盆相互贯通形成浩荡黄河东流入海，而且还以其海拔高程（宜牧不宜农）天然守护着黄河上游的稳定集水区。黄河在兰州以上（上游）的水量占总水量的 70%，但值得庆幸的是，上游地区的藏民基本上是牧民，其生产方式耗水极少，为中下游腾出了用水空间。不仅如此，黄河从花园口开始离开黄土高原，却继续搬运着黄土（这一过程目前仍在持续，黄河每年在入海口新造陆地 25 平方公里），^② 在东方从空地铺展出一大片直面海洋的华北平原，为中原文明的肇建与扩展创造了一个更广阔的地理空间。这是一个天设地造的文明孕育平台，曾经为中华数千年文明发展与赓续起着脊梁作用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便是在这样一个适宜的地理环境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从青藏高原一路奔涌而来的黄河，到兰州转向北流，随后又围绕着黄土高原西、北、东三条边缘刻写下一个巨大的“几”字弯。在其北部顶端，形成了数千年农牧文明冲突融合进而磨砺、锤炼中华文明及其社会经济体系特有品格的中心舞台。

二、黄土文明的锤炼与寻求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

“什么是文明以及社会经济秩序发育的最适地理环境”是全球史学界曾经长期关注的问题。早在 1940 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提出“挑战—应战”命题，试图解答此问题。他认为，文明起源于“挑战—应战”，如果文明的起源不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环境单独发生作用的结果，那么一定是它们二者之间某种交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企图发现的因素不是简单的事物而是复杂的事物，不是个统一体而是一种关系。汤因比借助全球若干古老文明的起源说明上述命题，在有关古代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中，他认为，在中国黄河下游流域，“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从种族上看来似乎差别不大，“如果说在这样一片广大的人群当中，有一部分人创造了文明，而其余人却在文化上毫无所有，我想这个理由也许是他们虽然全有潜伏的创造才能，可是由于某些人遇到了一种挑战，而其余人等却没有遇到的缘故”。^③ 可以说，黄土文明的发育与演进为汤因比的“挑战—应战”命题提供了绝佳的中国例证。

但是，汤因比只看到了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之严酷催生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而没有注意到黄土高原的特殊地理条件对于文明起源的重要性。实际上，文明的发育与成长需要适宜的环境，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的环境与条件介于严酷与舒适之间，正好磨炼人们的意志和生存能力，尝试各种交易秩序与治理方式。^④

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超大规模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周边文明的吸引力，也是使其成为核心文明区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黄土高原及其衍生地带（华北平原）有约 7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形成了史前全球最大的农业区，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拓展提供了物质与交换基础。简而言之，黄土高原的巨大空间与宜居特质，较早地塑造了黄河文明的超大规模效应，使其在与周边文明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地

① 肖明 《黄土高原：上苍为中国特制的“舞台”》，《中国国家地理》2017 年第 10 期。

② 单之善 《黄河日记》，《中国国家地理》2017 年第 10 期。

③ 汤因比 《历史研究》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年，第 74—98 页。

④ 肖明 《黄土高原：上苍为中国特制的“舞台”》，《中国国家地理》2017 年第 10 期。

位。超大规模（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的意义除了可资动用的社会经济资源数量大之外，还意味着人均分担的组织成本小或者公共支出的人均负担少，极大地提升了这一特定区域应对各种挑战（自然的和人为的）的能力。在文明竞争中，这一文明的相对力量上升，对周边文明产生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促使其向黄土高原汇集，进而通过“滚雪球”效应，使黄河文明进一步成长为核心文明，夏商周三代文明便是代表。

中国史前诸文明向黄河中下游的汇集进一步说明，中国先民探索最适制度安排的努力既是应对特殊地理环境挑战的过程，也是原生于黄土高原的不同文明之间从竞争冲突到妥协融合的过程。苏秉琦曾将中国史前文明的起源形象地描述为“满天星斗”，认为新石器时代甚至到夏商时期，中国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它们犹如天上群星散布在四面八方，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①这一时期大约存在了3000年左右，诸史前文明之间频繁交流，逐步汇集到中原这个更大的舞台，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最终产生了更高水平的核心文明。新石器时代伊始，华北的文化就包含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黑陶文化（龙山文化），在黄土高原东部边缘或者向东扩展带的豫西形成了仰韶龙山混合文化的中心；在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文化遗址中，同时发现源自红山文化的玉璧、玉环和源自良渚文化的玉刀、玉钺，显示了中原与周邻区域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以及周邻文化向中原靠拢并塑造文明核心区的历史趋势。^②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成本最低或者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黄土文明的特质本身说明中国早期国家应当滥觞于比夏代更早的尧舜禹时代，其推动力就是治水本身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集中配置需要，这是不少文献的共识。^③如魏特夫就曾提出“治水社会说”，认为中国的文明及国家起源与灌溉关系密切。^④拉铁摩尔指出，灌溉农业与文明发展的“中国方式”之间具有逻辑联系，“从地质、地理及气候各方所得的结论都集中到一点，如果不能控制水，农业就不能稳固，就不能供养众多人口，也就不能使他们摆脱靠狩猎及采集来补助生活的状况”^⑤。面对逐步扩展的文明核心区，兴修水利和保持宜农土壤的工作，非一家一户所能胜任，需要群策群力方能取得成效。黄河流域的早期灌溉农业逐步催生了文明发展的“中国方式”，这种方式的充分发展使中国历史中“容易趋于一致化而非多元化”，因为“灌溉农业可以造成（在工业制度之前）经济及人口的集中。没有灌溉农业的地区，特别是在雨量稀少且不稳定的地区，还有农牧并存的地区，会形成比较分散的经济和人口”。^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崇尚集体协作的文明便应运而生。在春秋以来周王室名存实亡、缺乏宏观调控能力的情况下，黄河中下游流域各国存在重新建立统一协调机制的内在需求。当时大国相较小国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前者一旦遭遇水旱灾荒，在空间上有较大的腾挪余地。因此，将较小的经济治理区域组合统一为较大的经济治理区域，对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是好事。实际上，中国古代中原经过“满天星斗”文明的渗透与积淀以及随后在黄河中下游的演进与发展，充分展示了千百年来处于这一特定地理空间中的人们与黄河淤塞以及水旱灾害进行艰苦抗争的历史过程。夏商周的文明核心区沿着黄河中下游的“东西”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01页。

② 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载《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55-56页；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5-16页；赵辉《史前文化有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历史趋势》，《中国国家地理》2017年第10期。

③ 钱穆针对“治水社会说”提出不同看法。他在1930年代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中，通过对《左传》“开阡陌”的含义的重新解读，证明晚至春秋战国时期方把阡陌（田间分隔的界垄）铲平，以便灌溉。历史事实也表明，中国大型灌溉工程的建造始于春秋战国之际。随后他在1955年撰写的《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一文中，对中国古史材料中与农作物有关的记载做了考察检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古代农作物如粟黍稻粱均为旱地作物且以“山耕”方式进行而与灌溉无关。此后，何炳棣在1969年撰写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中通过孢子分析技术对古代植物的物种分布进行研究检验，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参见杨照《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中国是怎么出现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95-98页。

④ 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⑤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38页。

⑥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38页。

展开（夏居中、商居东、周居西），俨然是一幅先民应对黄河淤塞与水旱灾害的制度创造画卷。如中原龙山文化的分布虽广，但都处于黄河中游平原之上，这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有利于文化交流与物资交换，容易形成统一的社会意识和宗教意识以及超出部落组织的政治实体和经济体系。相比之下，在中国南方，虽然不乏早期文明，但由于地理阻隔、河网纵横，各种文明呈现出碎片化存在的文化龛（cultural niche）格局，加上南方河流并没有像黄河那样经常泛滥，因此不易出现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治理体系。^①

黄河流域特殊的温带季风气候进一步强化了建立统一协调机制的迫切性。东南季风的强弱影响该地区的降雨频次与降雨量，直接决定着黄河流域的水旱状况与农业收成，进而影响着这一区域老百姓的生计和社会政治秩序。1911年之前的2117年间，这一地区发生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年均灾荒1.392次。^②地理气候条件非人力所能轻易改变，但人们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减少地理气候变化的风险损失，而扩大治理空间、增加腾挪余地、确立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便是古代中国长期探索而逐步形成的最适制度结果。

不仅如此，黄河文明的孕育与成长，还须考虑周边诸文明的影响。在建立集中统一经济体系的同时，需要辅之以一种灵活机动且能有效牵系周边文明资源的制度安排。其实，从夏代开始，人们就已开始探寻最适社会经济体系的各种实验，并且有所收获，形成了早期封建制度的雏形。《吕氏春秋·用民》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大禹让渡相应的资源配置权力进而获得各国尊崇，《尚书》中的《禹贡》，看似纯属地理刻画，实则记录了这种具有实用价值的财政治理方式。葛剑雄以为《禹贡》述及的九州非历史事实，“只是当时（战国后期）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政治理想”，而与此紧密联系的“五服制”更是胎死腹中。^③实际上，五服制度恰好体现了治水之后九州初定、需要在整体治理理念与尊重邦国自主权利之间实现融合的精妙设计。“芒芒禹迹”引出的九州与五服格局其实确立了既尊重万国（族群）又超越万国（族群）的新型结构。“朝向中国，不仅体现出核心的凝聚力，在行为上，亦有向心的动态趋势”，从此，“向心”成为华夏文明的文化空间结构与中国人的行为趋势。^④由此出发，统分结合、寓分于统，或者达成中央与四方（地方）在资源配置权力上的有效组合，便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和仁人志士艰苦追求和努力调适的一种最优制度安排。

三、农牧交错地带、南北沟通与经济体系安排

如果说黄河流域的文明锻造基本上沿着黄河中下游展开的话，那么还有一种意义同样深远的南北文明移动在持续推动着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并且对此后中国政治经济的演进方向产生深远影响。

横亘于黄土高原北部边缘的农牧交错地带形成了另外一种“挑战一应战”格局。从地理环境看，在中国的北部，有一条400毫米等雨线沿着东北—西南的方向延展开来。在这条线的两侧，形成了两大文明区域，即东南侧的农耕文明区域和西北侧的游牧文明区域。^⑤如果说前文所述的黄河中下游流

① 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王星光《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9-90页。

②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4页。

③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5页。

④ 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8-232页。

⑤ 李峰认为，作为“地带”（zone）而非“线”（line）的边疆概念对于研究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出现之前的中国前帝国时期的边疆具有重要意义，它显示了一个边疆如果要容纳多种文化变量，就必然要具备一定的“厚度”（thickness）或“深度”（depth）。边疆是一个中间的或者过渡性的地带，在这里，不同的文化相遇，不同的种族团体共存，不同的经济类型混杂。参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1-202页。无疑地，横亘于黄土高原北部边缘的农牧交错地带具备了作为“边疆地带”的全部特征。

域的淤塞与治水内生了社会经济体系的“东西一体化”需求（黄河在流经中原核心地带时大致是东西走向），那么，农牧交错地带的存在以及由气候变化导致的这一地带的变动则推动了社会经济体系的“南北一体化”过程。相比之下，后者的一体化范围更大，影响也更深远。

对于中国早期黄河文明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变迁而言，重要的不是农牧交错地带的实际存在，而是这个地带的动态变化。已有研究证明，气候变化不断推动着农牧交错地带的周期性变动。在近5000年的最初2000年（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11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殷商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2°C 左右；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平均温度上下摆动，在每一个400—800年的时期里，存在以50—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①若结合具体的历史年表，不难发现，平均温度的变动与中原文明以及王朝的兴衰周期大致吻合。

上述平均温度较高的时期正好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发育期以及紧随其后的夏商周文明的发展期，被称作“仰韶温暖期”（The Yangshao Warm Period）。^②西周以后中国3000多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个盛世（如西汉、盛唐）都处在气候温暖期，而动荡时期（如魏晋南北朝）则大致对应于寒冷气候。^③气候寒冷往往导致游牧民族南迁，由此推动农牧交错带的南移，这种移动通常会对同样经历气候冲击的中原王朝造成极大的外部压力，甚至导致政权倾覆以及长期战乱。有关研究表明，游牧民族疆域的南界纬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低达到北纬 $30^{\circ}24'$ ，南宋时期最低在北纬 $32^{\circ}18'$ ；相比之下，秦汉时期大致保持在北纬 $41^{\circ}18'$ 左右，隋唐时期最高达到北纬 $44^{\circ}00'$ 。^④

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的双重基因。农牧交错地带的存在既为双方文明营造交换空间，也为中原文明的赓续提供地理保障。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游牧民族不能在越过这一地带以后仍然保持原有模式，而需遵从地带南侧的文明传统，进而从农耕社会的破坏者变成守护者。游牧民族的每一次南下，都是融入中原文明的过程，反之亦然。换言之，经过一番争夺，长城以北地域依然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景象，长城南侧原有的农耕文明因为吸纳了新的血液而更加丰富多彩、厚重从容。^⑤自秦代增筑以及贯通先秦长城以来形成的这条实际控制线实际上划定了两种文明接触碰撞的天然地理边界。

若基于此，似乎注定了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场互相撕扯的双输博弈。其实不然，农耕社会以其超大规模效应对游牧社会具有吸纳与利用功能，使其进一步完成制度结构的周期性更新与再造。仅从文明成长机制看，游牧文明的产出效率低，移动性使其无法积累文明成果，而农耕社会则在每一次文明冲突之后均可获取相应的交易剩余，完成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组与更新。仅从这种

①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② 段万倜 《我国第四纪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

③ 蓝勇 《中国历史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61页。

④ 王会昌 《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

⑤ 1935年，中国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在《论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以东北之瑗瑗与西南之腾冲连线（这条线被学界命名为“胡焕庸线”，简称“胡线”），把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分，东南部占96%，西北部占4%。这条线正好穿过农牧交错地带，因此也是农耕与游牧的转换线。后来人们使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结果表明，“胡线”是一条岿然不动的线。参见单之蔷 《中国的突变线——胡焕庸线》，《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10期。这个结果进一步反映了人们“用脚给自然投票或者给宜农宜牧投票”的事实。千百年来，人们之所以向“胡线”东南一边移动，是因为那里拥有更多可以养活自己的水源与耕地。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事实一再表明，一些时期某些因素如战争、灾害以及官方推动等会在短期内改变人口分布，却无法长期脱离“胡线”。

意义上讲，农牧交错地带的存在为中国文明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驱动机制。^①失去农牧交错地带的冲突与熔炼，中国古老文明将不复曾经的面貌与内涵。

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提供了一个观察农牧交错地带政治经济格局的独特视角，他认为，最具组织性的游牧社会往往产生于中原王朝形成统一而强大的格局之时。^②在早期文明时期，处于这一地带两侧的农牧势力就已在谋求使双方政治经济收益最大化的最适制度安排。基于这种诉求，双方逐步确立了相互依存的战略关系。不过，只有这条难以逾越的特殊地带的存在，才使这种战略关系的确立成为可能。独特的地理条件为制度妥协机制的形成搭建舞台，经过数千年的反复锤打，最终塑造了中国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从而极富弹性、韧性和张力的独特格局。透过千百年来的长城烽烟，我们应当感谢这条农牧交错地带的伟大地理馈赠。

农牧交错地带的存在，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塑造提供了一个天然地理平台，而这个地带的周期性摆动特别是向南移动，则如波浪般推动着中原文明向长江流域甚至更南的海洋空间迁移。这种迁移大都导因于游牧民族越过农牧交错地带南下形成的第一波次冲击，客观上导致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大社会经济后果，那就是中原地区人口的向南迁移（第二波冲击）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③自西汉以来，中国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三次大的人口南迁，均与游牧民族的南下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诸如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以及北宋靖康之变等。据统计，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东南地区户数占全国的比重仅为10%，晋太康元年（280年）增至30%，唐天宝元年（742年）达45.1%，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为65.9%，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接近90%。^④与此相联系，随着长江流域河湖丘陵土地资源的开发、水利建设的推进以及稻麦的引进推广，经济重心从唐宋之际开始迅速向江淮以南移动。从此以往，不仅“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广为流传，对于历代王朝而言，这里也成为其长期倚重的“东南财赋地”。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即便经济重心南移，但游牧文明在北部边境地带的强大存在使中原统一王朝只能将政治中心长期留在北方，形成与经济中心疏离的格局。这种状况决定了南北资源沟通的内在需要和政治统一的迫切性，进而形成特殊的经济体系。隋唐以降，但凡统一的王朝，都须想方设法疏通并保持南北经济资源的交流或输送通道。如隋代开凿大运河是当时沟通关中河洛政治中心和江南经济中心的内在需要使然。而对于长期建都于北京的元明清三代而言，大运河的畅通与否更是直接牵系着王朝的命脉与盛衰。

^① 王明珂曾经提醒人们应当澄清有关游牧社会的几个误解，他认为，从最基本的层面看，游牧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食草动物之食性及其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也就是说，游牧社会是人们利用边缘、不稳定自然资源的一种经济社会生态体系，它并非如学术界一度认定的那样，是人类文明史上由渔猎向农耕演进的中间进化阶段，更何况世界上几种主要类型的专业化游牧社会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前400年之间，远较原始农业的出现为晚。更为重要的是，游牧人群并非文学作品中通常描述的那样总是如野兽般争狩残暴，其实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组织特质、行为方式与理性计算。如其不然，就不会在农牧交错地带与中原农耕文明长期对峙，并反复锤炼中华文明的特有体魄与胸襟。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9、26页。

^②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16页。

^③ 在历史上，农牧交错带的南移曾经引致了一个“意外”的环境后果，即“黄河安流”局面。谭其骧提出并解答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的问题。其中的要害是，东汉末年，中原政权忙于应对内部问题，逐步放弃北部临近黄河中游的边境郡县，迁徙人民于内地，匈奴随即“转居塞内”，导致牧进农退，结果是黄河中游植被恢复，水土流失减缓，由此使黄河下游地区保持了长达五个多世纪的相对平稳状态。参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④ 参见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1页；华林甫等《中华文明地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8年，第203页。实际上，伴随于此的还有影响更深远的文化重心南移。如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使大量北方文化移民进入长江流域，南方文化教育地位开始上升；唐代中期之前一段时期，中原文化一度复兴，但后经历安史之乱、唐末动荡和北宋靖康之难，中国文化教育中心随之东移南迁，从此形成所谓“江浙人文薮”的景象。这种景象历经元明清直到近代数百年的保持与演进，遂成中国文化地理之基本格局。

巴菲尔德曾经认为，“到唐朝时期，南方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最密集和最丰饶的地区，因为北方是中原文明的发源地，这一地区就算不再能自给自足，也还是不愿被放弃”^①。其实，历代王朝不愿放弃北方的真正理由不是因为文明发源的“乡愁”，而是农牧对峙对王朝统一格局的牵系。可以说，农牧交错、政治中心留北和经济重心南移，由此造成的社会经济资源的“垂直流动”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农牧交错地带文明冲突的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格局的南北依赖态势，这种态势进一步成为中国崇尚政治统一理念的基本原因。

不论基于何种原因，社会经济资源的南北垂直流动（特别是南北互动）对于塑造中国刚柔并济的独特制度内涵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若追溯更远，这种格局自史前文明阶段已初露端倪。那时，初露文明曙光的北方文明如红山文化沿着苏秉琦刻画的“Y型”文化交流带的东北路径南下，^②而来自长江流域的诸文明如良渚文明则沿着“郟庐断裂带”等通道北上，^③它们先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带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相遇融合，最终塑造了中原核心文明，并为此后的夏商周文明奠基。

应当注意的是，文明或者资源的南北垂直流动具有特殊的经济学含义。换一角度看，我们已知，中原核心文明区域因为其超大规模和广袤的地理格局，形成集中统一的农耕经济制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分处南北两边的文明区域却有着异样的景象。北方农牧交错带之外的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流动性极大，形成松散的组织体制，其优势是自由灵活，不墨守成规，善于应变，它们善于从动态中获取和配置资源。南方是稻作文明，群山参差，水网纵横，经济组织总体上呈现松散自治的特性，宗族和地方治理的色彩浓厚。可以想象，当南北两大崇尚自由松散精神的文明进入中原崇尚集中统一制度的文明，或者说，在中原核心农耕文明的南北两端，存在两大崇尚自由松散精神的异质文明样态时，必然会对核心文明产生巨大的重塑作用。夏商周以来，先民们的制度选项，如始于三代的分封制和后来在秦统一后推行于天下的郡县制，正是在这种不同地域史前文明的冲突互鉴过程当中确定的。

四、基本经济区的形成、结构与组合效应

从既有的文献看，中国经济学家冀朝鼎最早提出并系统阐释了“基本经济区”范畴。他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有些地区会比其他地区更受重视。每一个受重视的地区，官方都会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进行重点发展，目的是建立或者维持所谓的‘基本经济区’”；而且，“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中国的关键”。^④冀朝鼎按照历史演进顺序给出了不同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如秦汉时期的关中、黄河下游地区，即中原地区；隋唐时期还要另外加上长江流域，由此形成两大基本经济区连成一片的格局；两宋以后，基本经济区重心南移，到元明清时期，中原地区、长江流域（包括成都平原）和华南地区几大经济区连成一片。

无论如何，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基本经济区。那里有一片当时全球最大也是养活人口最多的宜农区域，有人据此认为，中原文明具有超大规模性。^⑤不少文献表明，黄土富含碳酸钾、磷和石灰，只要风调雨顺，就具有得天独厚的自我施肥能力，^⑥加上这一区域还拥有人类生存必需的其他资源如解池盐等，使八方文明竞相汇集于此（“宅兹中国”）。早在6000年前，黄河文明与长江下游文明已有交流，但总体方向是朝着中原地区汇集。根据张光直的考察，在公元前7000年时看来没有

① 巴菲尔德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② 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58-161页。

③ 张经纬 《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34页。

④ 冀朝鼎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⑤ 施展 《枢纽：3000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⑥ 冀朝鼎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15页。

什么联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到了约公元前 4000 年时，则“看见了一个会持续 1000 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大”^①，这个具有文化相似性的网内位置便是“最初的中国”和中原基本经济区。

中原基本经济区的形成，除了先天的黄土高原地域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八方文明交汇渗透的结果。或者说，只有经济因素，没有文化的积淀与凝聚，无法成就基本经济区。旧石器时代以来，在古中国的四周曾经存在与中原具有同等水平或近似水平的文明，其中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三大文化系统得到充分发展，并在发展中不断交流，互相渗透、吸收与反馈。考古成果一再揭示，“在黄河中游的文化中，可以找到东、南两面文化的成分”；各种原生型文明在向中原地区汇集的过程中，形成“逐鹿中原”的态势，开创了一种特有的“漩涡模式”。^② 基于这一模式的驱动，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率先形成基本经济区。

紧随其后的是基本经济区的扩展。如前所述，中原基本经济区的形成得益于特有的黄土地带地理条件和周边多元文化的汇流，是“有土著起源和特色的几个区域性文化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这个相互作用圈形成了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③ 在这一基本经济区形成之后，先后孕育和托举了周秦汉唐北宋的社会政治变革与经济文化繁荣，也经历了来自农牧交错地带的数次文明冲击。结果之一是江淮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会，随着人口与文化的南移，这一区域的经济文化分量迅速上升，逐渐形成可与中原地区比肩甚至有所超越的另一大基本经济区，即长江中下游基本经济区。从此，在广袤的黄河、长江流域（即中国的“两河流域”），两大基本经济区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影响，共同搭建起中国千百年来社会经济体系演进的基本格局。

基本经济区的形成逻辑以及静态分布自然重要，但更有意义的是基本经济区之间的动态组合，因为它直接决定着中国整体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与演进。如果我们遵循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划分法，将中原核心区定义为基本经济区 A，长江中下游区域定义为基本经济区 B，四川盆地定义为基本经济区 C，西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定义为基本经济区 D，那么，纵览中国政治经济演进历史，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如果要建立至少覆盖“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的统一国家，就必须同时拥有基本经济区 A 和 B，秦汉隋唐元明清等朝代都不例外。如果一方占据基本经济区 A，另一方控制基本经济区 B，结果极有可能是南北分治，南北朝、五代时期便是如此。如若在拥有基本经济区 A 的情况下得到 C，则会打破均势，亦即有条件进一步得到 B，进而完成大一统。

上述动态组合格局中统一局面的形成，除了前面提及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南北分离，基本经济区 A 的相对分量下降，需要借助相邻基本经济区（如 C）的帮助，方能保持对已然南移的经济中心的控制这一原因外，统一与分立的制度选项还进一步取决于各个基本经济区之间的互补与依存。这又进一步牵扯到中华文明初创时期不同文明并存赋予的“和而不同”“因俗而治”等包容性制度治理理念。这使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演进过程中长期保持了不同的地域特色；特色内生依存，同质导致排斥。区域差异为统一的制度结构增添了内在活力，避免了僵化与衰败，而统一格局形成的资源动员与

^① 张光直 《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载《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152 页。

^② 参见苏秉琦 《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 年第 12 期；张光直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载《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54-55 页；许倬云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3-35 页；赵汀阳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年，第 15 页。

^③ 张光直 《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载《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第 158-160 页。

配置的规模效应又为不同地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稳定和可预期的政治条件,使不同地域在资源互补中节约交易成本、分享交易剩余。这也是中国数千年来经济增长周期性起伏,但文化内涵与制度结构能不断更新、容纳各种外部冲击而不曾中断的深层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次第实施恰好表明,早期基本经济区之间的动态组合格局中其实包含着后来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制度智慧。

五、边缘冲击与经济结构的更新

对于中国早期社会经济体系的确立与演进而言,中原文明核心区以及中原基本经济区的形成至关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基本内涵与面貌。一开始是“满天星斗”般的早期文明及其演进共同塑造了中原基本经济区,紧接着中央王朝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自然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在自己的周围,使其输出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锤炼派生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之后,将其传播至周围各区,从而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①但是,中原农耕文明本身具有一个无法回避且又难以自我疏解的弱点,即由其内敛而稳定的结构以及对整齐秩序的维护所产生的惰性。好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明特质赋予其特殊的惰性化解方式,那就是借助边缘冲击完成经济结构的自我调整。有赖于此,孕育于古老文明摇篮中的中国经济体系一直能够吐故纳新并长期保持生命力。

问题的关键或许是,中原核心区更高层次的文明并未取代各区域原生型文明,后者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和延续了它们的独特性。从长期看,这种状况最终倾向于形成统一而又多元的独特经济格局,而正因如此,当面对后来更强烈的外部冲击时,中国经济体系能够保持足够大的弹性与韧性,使之在经受任何猛烈的外部冲击后,除了尽可能多地汲取“他者”文明营养,还能继续保持“中国特色”。若着眼于长期历史发展进程,这种面对外部冲击而保持“中国特色”的秉性,无论周秦汉唐,还是宋元明清都是如此,而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经历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崛起的当代中国也不例外。

换个角度看,中原地区文明核心地带早早确立,其辽阔的疆域和高度的同质性使外来的异族或者文明即便侵占了它的部分地区也无法将其摧毁。^②更重要的是,这种核心地带效应及其超大规模性质进一步衍生出中原文明面对外部周边文明冲击时的特殊“边缘冲击效应”。拜黄河早期文明以及周边诸早期文明汇聚积淀所赐,中原核心文明具有足够大的弹性与吸纳能力,进而足够坚韧与厚重。有了这种文明特质,使后来任何异族文明对它形成外部冲击时,只会对其产生激活和补偿效果而不具有替代性。或者说,来自周边其他文明的冲击随即被转化为文明浸润,延展和拓新了核心文明的内在结构。即便是在经历40余年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效应依然存在并发挥着新的作用。

可以说,如果没有边缘冲击,中原文明的社会流动性就会逐渐衰减,制度体系也会积攒起越来越厚的惰性,进而丧失自我更新能力。不管是因气候变化而周期性出现的北方游牧文明的南下冲击,还是近代以降来自海洋文明对于大陆文明的外部冲击,都检验着中原文明或者中国文明本体的吐纳能力与调适机制。对于中原农耕文明来说,来自草原的游牧文明和来自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正好为其补充了平等、独立、开放与自由等元素。而近代以降来自欧美的海洋文明,撇开其带来的文明创伤与民族羞辱不谈,从长期角度客观地看,其包含的开放、自由以及规则意识也为近代中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制度营养。

实际上,每一次外部冲击,考验的是被冲击者的消化吸收能力。只要自身的结构足够健康、消化能力足够强大,就完全可以“洋为中用”,将外部冲击转化为有利的营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①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兼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源性》,《九州学刊》1987年第1期。

^② 詹姆斯·K. 菲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胡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7页。

之所以在纷繁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迅速崛起，就是因为很好地消化吸收了外部因素特别是欧美市场经济制度的有用成分。而若追溯起来，能够做到这些的底气早就蕴藏于数千年前开始孕育成型的中国文明结构的深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如今的中国已然站立于世界经济发展舞台的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在传承中国数千年经济体系优秀遗产的同时，敞开胸襟直面新的外部冲击且在此过程中有效兼容外部世界特别是欧美经济体系的合理成分，这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奥妙所在，也是“中国之治”题中应有之义。

六、结语：探寻中国经济体系的最适结构

早在数千年前，中国先民就已在广袤的黄土舞台上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体系肇建实验。根据一些考古成果和文献研究结论，夏代似乎初有尝试，殷商基本定型，到西周臻于成熟。^① 中华文明初创时期，各种文明如“满天星斗”般闪耀，无论是夏禹之万国还是商汤之三千国，它们都是独特而又活跃的文明形态与经济个体，若要实现有效整合而又不伤及其独特性，具有“和而不同”内涵的封建制便是最优制度安排。不仅如此，由于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组合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长期追求，因此，在此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样的尝试似乎从未间断。

千百年来，人们在不断探索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最适结构，留下了不少例证事迹与真知灼见。早在西周初期，便有齐太公吕尚“因俗简礼”与鲁公伯禽“变俗革礼”引发不同政治经济结果的例证，^② 凸显了选择适宜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当时，封建制虽然处于初创时期，其内在矛盾尚未显现，但如何处理王令统一与诸侯国自主权之间的平衡难题则隐约可见。七八个世纪之后，秦统一六国全面推行郡县制但崩溃于倏忽之间，汉初以广建诸侯纠其偏却又面临同姓诸侯日益坐大的难题。面临千年以来未有之变局，贾谊在给汉文帝上的奏疏《治安策》中提及“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主张，明显包含着探究和实践制度均衡的意蕴。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治理结构时常在封建（分权）与郡县（集权）之间周期性摆荡。有没有一个均衡解呢？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郡县论》中对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利弊得失以及二者之间的搭配关系做了极为深刻的阐释，他认为，封建制与郡县制各有利弊，“封建其专在下，郡县其专在上”，既然如此，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出路呢？他的答案是“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不过，进一步的问题是，既然要将封建制的分权之意渗透于郡县制的集权制之中，那么，怎么掌握“寓”的分寸，或者说，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合适的搭配比例呢？对此，顾炎武并未给出答案。

三个多世纪之后，历史学家许倬云似乎找到了答案，只不过在他的视野中，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搭配已然转换为王权（上层）与社会（下层）的组合。^③ 他认为，西汉与盛唐之所以出现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最基本的原因是这两个时期在上层与下层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制度均衡。他以帝国高级官吏的出身（自上而下的承袭还是自下而上的擢拔）为参照，得出结论：一旦上层与下层达成 1/3 和 2/3 的权力分配，则意味着出现社会各方力量对比的均势，从而构成一种均衡。无独有偶，

^① 《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云云，从中似可窥见分封制之雏形。到了商代，则存在较为完整的分封制度，并为西周的封建制开辟道路。参见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16页。

^②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太公吕尚“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③ 许倬云《历史分光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22-226页。

西汉与盛唐正好符合这一比例。^① 我们不妨将这一比例初步认定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黄金分割”，虽然这一结论的成立与否尚需进一步的论证与检验。

此后一段时期，有关此问题的讨论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始料未及的是，重拾这一话题的竟然是年逾百岁的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更出乎意料的是，他一语惊四座，竟然在西方强烈质疑中国市场化改革偏离主流道路的声浪中提出了“中式市场经济”命题。如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由草根改革与政府领导的政策实验共同推进的”，由此逐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与“英国、美国或者其他现存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② 张曙光对此认为，制度变迁的奥妙“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互利，是共存，是多赢”，观察中国改革绩效的关键“不仅在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改革（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更重要的在于两种改革之间的关系”。^③ 英国经济学家特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过程采用的经济模式“将激烈的市场竞争元素与国家主导元素结合起来，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功”，“成功的发展战略总是在市场约束和国家干预之间达成平衡”。^④ 这就意味着，政府也是市场经济的组成要素。

“中式市场经济”命题提示我们，若将顾炎武的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搭配转换为市场与政府的组合，则中国经济体系最适结构的内涵将会是“寓市场之意于政府调控之中”。政府与市场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市场化改革本身并非意味着排除或者替代政府，而是探寻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最佳组合方式，以便更有效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迄今为止，人们似乎未曾意识到，这种结构的形成与数千年来中原文明面对边缘冲击时的互补而非替代的情形具有历史逻辑上的高度一致性，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伴随于此形成的追求政府与市场之间平衡的国家治理理念，其要义已然蕴藏于中华文明之所以赓续数千年的特殊结构之中。

责任编辑：孙中博

^① 易中天持近似观点，他认为“西周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权制’，从天子到诸侯，都不集权。至少在贵族阶级那里，相对独立，比较自由，有等级但不森严。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事情就变得糟糕。不过汉唐时期，中央集权和个人自由找到了平衡点，因此中华文明达到了鼎盛。明清两代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每况愈下。”参见易中天《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② 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27-237页。

^③ 张曙光《边缘革命、区域竞争和思想市场——读〈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读书》2014年第2期。

^④ 阿代尔·特纳《危机后的经济学：目标和手段》，曲昭光、李伟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 A Historical-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Zhang Jie (81)

In spite of the massive academic attention given to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levant literature as a whole lacks a historic-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which indeed can offer a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its formation in history. The paper argues that in the formative process the initial geographical endowment not only exerted an irreplaceable influence but also dictated the path of evolution.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our ancestors, confined to the Loess Plateau, were in consistent pursuit of a desirable low-cos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n the one hand, various civilizations converged into this region and shaped the central cultural area of China characteriz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harmony in differences" and "governing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ustoms";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plateau being the overlapping region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clash and integration became a constant scenario which had a lasting effect on the economic behaviors of the central area. This justified one strange phenomenon in both Tang and Song Dynasty - with the economic center gradually moving southward, why the political center chose to stay in the northern part. Such a combination in space occasioned a huge demand for unified and coordinated economic mode. Moreover, the border impact from the nomadic civilization, together with the external impact from the west in modern times, incentivized the self-examination, maturity and upgrading of the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ough for most of Chinese history, its economic system remained in a state of regular swing between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prefecture system, the success of Han dynasty and Tang dynasty suggested that an optimum system requires reasonable deployment of the upper class and the folk forc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such an idea went into the reform process initiated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taking the form of a desirable mixtur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performance of which has been ideally tested by reality.

On the Ecological Pattern Changes of Media Ar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Hu Zhifeng Chen Yin (173)

Integration, a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media art development,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ecological pattern changes of media art,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technology integration, media integration and platform integration. Under the new environment of new media art,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art are integrated. On the basis of symbiosis and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forms represented by film, television and video, media art has realized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media and platform, presenting a new trend after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cological pattern of media art in the integration era, we need to treat the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media art and new media art dialectically.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i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edia art and new media art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also promote each other.